

“经济政治”范畴分析

刘德厚

一、对“经济政治”辞源的考察

“经济政治”作为一个范畴，人们对它似乎既陌生又熟悉。因此，有必要就其辞源进行一番探讨。

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现象作为一个新学科领域来研究，是我发表在1988年《武汉大学学报》第6期的《生产力标准与政治学理论研究》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文章说：“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处在社会主义发展较低阶段的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从政治上的基本特征看，都还是处于阶级与非阶级交叉的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的发展从阶级领域的政治向经济领域的政治扩展，由阶级的政治向社会的政治转化。为了适应这个历史时代政治的重心和实质所发生的变化，我认为完全有必要提倡建立一门‘经济政治学’，来研究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以开拓社会主义政治研究的新领域”。文章并就“经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发表了初步见解。当时，我还主要是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些新的政治现象的思考。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经济政治”并不是某一社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早已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而且，在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史中，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对于这种形态的政治现象的分析。但是，把“经济政治”作为独立领域进行研究，主张建立一门政治学的新分支学科，那当然是我们现代人所要研究的事。

“经济政治”这个新的专业词汇，在中外辞典中都还不曾被发现。最常见的是将“经济”、“政治”两词连用为“经济与政治”、“政治经济学”等。“经济与政治”一词是表示这两个相对独立范畴之间的互相关系。对于这种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毛泽东曾作过一种权威性的表述：“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①另外，国内出版的某些杂志和书籍的名称中，也出现过政治—经济的连接，这多半是指政治和经济的领域方面而言，并不是一个专用名词。政治经济学，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类的一门学科。它一般被理解为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

当我们谈论到“经济政治”和“经济政治学”时，容易使人们与“政治经济学”发生联想。以为两者只不过是政治与经济词语排列组合上的不同而已。“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类的一个分支学科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自从法国重商主义学者安徒厅·德·孟克列钦（1575—1621年）在161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首次使用“L'économie politique”一词以来，“政治经济学”一词在法语中先于英语出现。1767年詹姆斯·斯图亚特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political Economy就成了英语中最初使用“政治经济学”的专业用语。但由于Economy是从希腊文字οικονομικος演变而来，它兼有经济 and 经济学双重含义。因此，Political Economy既可译为“政治经济”，也可译为

“政治经济学”。为了使英语中“经济学”一词与其他学科（如数学 mathematics、物理学 physics 等等）的词尾“ics”相一致，使用英语的国家 19 世纪末就有人提出在 Economy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字尾“ics”，比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就使用了 Economics 一词。^② 这样，Economics 就用来专指“经济学”。于是，在当今西方属英语语系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著作中出现了两个术语，即：Political Economy（译为“政治经济学”），和 Political Economics（译为“政治的经济学”）。

从学科意义上分，“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经济学”是不同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指出：政治的经济学“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决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方法上，它一方面是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如用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等经济指标来检验政府的行为和声誉；另一方面，是分析政治因素如何在经济政策中发挥作用，比如西方政府往往是在临近选举时，制造市场繁荣的假象，以改善他们的形象，增加他们重新当选的机会。西方学者把这种与争取选举相关联的“商业繁荣”，称为“政治商业周期性”。所以“政治的经济学”几乎完全摆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套术语，成为一门用经济学作分析工具研究社会若干政治现象、政治学 and 经济学相交叉的新学科。在英语中用 Political Economics 表示与 Political Economy 相区别，现在中译文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区别。^③ 但西方“政治的经济学”也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政治”或“经济政治学”。

我们可以这样说，“经济政治”其意可追溯于我国古代“经济”一词。古代汉语中，政治一词先于经济一词出现。政治即指“政令”或“国事”。^④ 当时，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一词还不曾出现，而是用“衣”、“食”、“地”、“利”、“富”、“商”、“侈”、“俭”、“黄金”、“通货”……之类具体物质形态表达经济的某种含义。《管子》一书是我国古代具有最为明确表达“经济政治”思想的伟大著作。它提出：“地者政之本也”。^⑤ 把土地看作是封建政治统治的最根本性的东西；又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⑥ “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廩实而囹圄空。”^⑦ 把国家安乱，政治良窳，最终归结为社会能否首先让人民有充实的物质经济生活。主张治理国家必须从经济着手，实施富民政治。胡寄窗先生在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指出：“《管子》一书将唯物观点贯彻到政治、伦理等各个方面，特别强调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政治、伦理观点的基础。……不论是‘法’、‘义’、‘礼’、或其他伦理概念，无不被赋予一定的经济内容。”^⑧ 继《管子》之后，在我国古籍中逐渐出现了“经纶”、^⑨ “经学”^⑩、“经济”等词。汉语中经字用作动词，其意为治，用作名词其意为治道之常规；济字与齐字相通，有整齐调和之意。“经济”二字连用，大约出现在公元四世纪。源于“经邦济世”、“经国济民”。不论是唐代出现的“经济学”、还是清代的“经济之学”、“义理之学”、“经济特科”……实际上都被理解为治理国家，拯救庶民。其内容不仅包括经济、财政、以及工程技术方面，而且也包括政治、军事、法律、教育诸多方面的问题，是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中国古汉语中的“经济”一词在本意上就具有与“经济政治”相近似的内含。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西方经济学通过日本人的介绍开始传入我国。中国一些学者，经过斟酌和争论，才接受将 Economics 译为“经济学”。^⑪ 此后，古汉语中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含义也就逐渐为现代一般的人们所淡忘。

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界涉及和使用与“经济政治”相近似的词是在本世纪60—70年代以后。1970年美国金德尔伯格教授出版《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政治学》一书，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经济学的政治学”的研究，着重探讨当今时代世界市场经济对国际关系影响。^⑩1980年日本学者三好修在《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一书中说：“笔者（即指三好修）在这里提出一个新的战略概念——经济政治学”，试图研究发达国家如何通过提供商品、机器、装备、管理技术、科技和资本等作为实现政治扩张的战略手段。^⑪他们两人都是旨在研究国际关系中的经济政治的某些内容，但各人所持的角度不同，金德尔伯格是从世界市场研究国际政治问题，而三好修则是把国际经济的某些活动和杠杆视为实现国际政治战略的手段。另外，西方70年代发展起来的所谓“公共选择与分析”，人们通常称之为“政治学的经济理论”，即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政治过程以及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研究各种政治机构的活动方式以及政府、党派、选民、利益集团和公共官僚机构的行为，实际上是西方研究现代经济与政治问题一种新方法。所以有人又把它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或“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另外，1978年由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石川荣吉主编的《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曾把部族的领导权，称为“经济的政治侧面”。认为人类早期的政治生活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的政治生活。^⑫但是作为一门政治学的分支学科，“经济政治”的基本内含到底是什么？上述中外各学派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二、“经济政治”的基本含义

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对“经济政治”的内含应作何种解释？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经济”与“政治”这两大领域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的。从其学科形成史看，它们经历了“合一—分—合”的辩证发展过程。

在古代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两词虽然已出现，但没有真正形成两个独立的学科。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有着大量的经济思想的论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曾写了《经济论》一书，所讲的是关于家庭的管理问题。当时，对国家财政、商业、货币流通等这些经济问题多半是放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中进行研究的。中国在清代晚期以前，所谓“经济之学”，实际上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所以，我们可以说古代对于政治、经济问题基本上是合二为一来研究的。

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是建立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⑬古典政治经济学各派虽然都在Economy前冠以Political，但他们都强调自己研究的对象是纯经济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建立之后，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注意到了物的关系的人格化，即使如此恩格斯依然还是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称之为“经济学”。^⑭到“马歇尔经济学说”出现，^⑮在一部分英美学者看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使用稀缺资源进行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获取最佳效益的一门学问，主张把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马歇尔所著《经济学原理》一书影响很大，致使在本世纪相当长的时间，西方“经济学”前都不冠以“政治”一词。这样，“政治”与“经济”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被完全区分开来。^⑯

本世纪60—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基础作用广泛加强，经济与政治相互依存，彼此渗透。首先又是一部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者发现了政治和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相互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回到政治经济

学去”的口号。他们主张把经济与政治综合起来，以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有关的政治学科。于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学派由此应运而生。这一思潮的起源至少要追溯到本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于是凯恩斯率先推出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确立了“政府应为市场制度的合理调节者”的新思想。此后，又有一部分政治学者提出“政治应通过利益集团的竞争来全面反映社会的意志”。但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增强、政府的财政赤字与日俱增的同时，又发生了大量政府开支为某些掌权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侵吞的严重现象，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危机不断出现，国家干预走入了怪圈之中。针对这种情况，以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心，从理论和对策上专门探讨如何解决政府在实行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时所带来的种种政治性的弊端。于是，他们以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为依据，设定在西方社会中，政治制度就象市场制度，许多经济学的原理可以用来作为社会政治的分析工具。布坎南说：“使用或多或少自然地扩大交换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家便能按照交换的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①美国经济学者C·E·林德布洛姆在其《政治与市场》一书中指出：当今“在世界上所有经济系统中，政治活动大多就是经济活动”。而另一些政治学者则提倡要将政治研究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经济领域，一时间，应用经济学作分析工具政治科学的研究火热起来，如提出所谓“政治成本分析”、“交换理论”、“选票的本利分析”等新概念和新观点。^②

从上述两大学科发展的相关性中可以看到经济学科和政治学科相交叉的必然性。“经济政治学”就是由其相交叉而产生的新学科。

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中，形成“经济政治”这一独立范畴。理解“经济政治”必须对“政治”概念有新的视野。从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来考察，阶级的政治只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的历史现象，在阶级产生之前和它消失之后，政治不能不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笔者认为：政治是社会的政治主体的利益全局关系所支配的一种社会公共权力活动。在阶级对抗性的社会条件下，政治主体的全局利益集中体现在国家政权上，所以阶级的政治的核心理所当然的可以被理解为是国家。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本质理解为社会的政治主体的全局利益关系，那么，当社会的经济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社会利益关系的全局性地位时，经济不仅继续发挥它的物质基础作用，而且，要直接发挥其政治功能作用，即成为解决社会政治主体的全局利益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的一种途径、方式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经济政治”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的政治功能性。经济政治是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事实。因为人类社会生活，总的说来是由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三者有机构成的。它们在以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以社会关系为纽带，以文化生活为氛围，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互相渗透和转化，从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相应的出现了三种基本的政治形式，即一是经济形式的政治，二是社会公共权力（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指国家）形式的政治，三是文化形式的政治。过去的政治学说多半局限于社会公共权力的政治形式的研究，如传统政治学对国家形式的政治研究；本世纪50—60年代兴起了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等。而关于经济形式的政治研究则长期被人们所忽略。其实，“经济形式的政治”也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必然存在的重要形式。

三、经济的政治功能

但是，当我们提出“经济形式的政治”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要遭致一些人的误解。

他们耽心提出“经济政治”这一独立范畴,会把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或者会导致政治干预经济,或者经济代替政治。在他们看来,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这实际上是用一种孤立、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政治的本质可以是同一的,而形式则是多样的;经济的特征是独有的,而功能则是双重的。一定社会的经济不仅具有物质功能,而且具有政治的功能。

社会生活中经济形式的政治产生,是与经济具有双重功能分不开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经济的物质基础功能认识比较充分。因为,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只要稍稍懂事的小孩都确信的一个明显真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衣、食、住以及其他的東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④正是社会经济的这种物质功能作用,奠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从而派生出了社会经济的政治功能。因为,在一切社会中,人的关系的物化和物的关系的人格化,以及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相互关系,说到底都是通过社会劳动配置和变换来实现的,从社会劳动的配置与交换的角度,来研究对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由经济利益而导致的政治利益关系的控制与协调,发挥经济的政治功能,达到发展社会经济、满足需要、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的目的。

社会经济的物质功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其政治功能则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这就是说,经济的政治功能的作用,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生和表现出来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生活史,就不难看出社会经济的政治功能的这种特点。比如在人类早期阶段,“经济政治”处于一种初始自然形态,氏族、部落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管理着作为社会基本单位氏族的“全部公共事务”,^⑤维系着两种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种原始社会的“治理”活动,实际上是一切为了人的最低需要而向自然索取的一种自然长成的“经济政治”。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十分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⑥在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经济政治”、“文化政治”一般都处于“国家形式的政治”支配之下。但国家仍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⑦所以,在上述意义上恩格斯说:“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否认社会生活中必然存在的“经济运动的政治”。^⑧而只是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经济形式的政治一般要服务于国家形式的政治。二十世纪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开始了公开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福利国家”成了协调劳资矛盾的重要工具,国家的经济作用大大加强。经济形式的政治兼伴所谓的“政治民主”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国家通过应用某种经济的杠杆,进行着政治的统治。日本称自己是“经济国家主义”。日本金融学者路易斯·马尔肯指出:“在80年代,各国致命的弱点,是不了解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⑨

同时,另一情况也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当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基本被消灭,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到了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方面来的时候,社会面临着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的严重事实。解决这一严酷的现

实问题，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焦点。邓小平同志结合中国的情况把这个问题讲得最为清楚明白，他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②我们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的集中表现。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经济政治的表现和特点是不同的，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基本区别。前者是同国家、阶级、私有制相联系。其经济形式的政治在本质上是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社会集团进行治理社会、实行阶级统治的手段，经济政治必然表现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后者则同人民国家（即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和公有制相联系，是广大人民群众从阶级的“政治解放”走向社会的“经济解放”的重要形式。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就是要求在组织人民发展经济向自然开战中，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实现着人的经济、文化的彻底解放。在人类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人对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依存于物对人的统治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为目的的科学。^③恩格斯后来对此解释为“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④当然，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政治的具体形态和特点到底怎样，这得要靠我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来创造和总结。但不论怎样，经济形式的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这一点，我想是用不着怀疑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社会中还存在阶级政治与非阶级政治的交叉，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也必然受复杂的历史条件的制约。

正是由于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基本类型的经济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经济政治也与日俱增起来。本世纪70—80年代世界形势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不断呈现出许多新的历史特征，“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被推到了世界历史潮流的最前沿。世界范围内的矛盾与冲突在表现形式上和斗争方式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世界性的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相互争夺的形式和主战场转向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反对强权政治，改善人民的贫困生活状况，也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战略目标放到了首位。同时，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有了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国际间经济问题往往成为矛盾的交点，或者上升为国际政治战略的中心。所谓的“经济援助”、“经济封锁”、“经贸大战”以及“经济外交”等统统搬上了国际政治的大舞台。在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经济政治”不可避免的要为政治学科所关注。

我们建立“经济政治”新概念，就是为了科学解释和分析当今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以及“国际经济政治”提供基本理论框架。

总之，“经济政治”和“经济政治学”是要在一国内和世界范围内，以社会经济发展所直接引起的社会政治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经济的政治功能形态、性质和特点，揭示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过程中政治发展的规律性，探讨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对策和手段的政治科学。作为政治学科类的经济政治学，我们可以把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大体归纳为：一、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公平和社会解放问题；二、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政治与社会控制体系问题；三、关于人类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问题；四、关于社会经济利益分配

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协调问题；五、关于人的素质改造、提高与社会政治秩序维系问题；六、关于国家、政党、社团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问题；七、关于一国城乡间、地区间、民族间社会经济不平衡与社会政治矛盾的解决问题；八、关于人口控制、社会经济短缺或生产过剩中的社会政治危机问题；九、关于社会经济的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问题；十、关于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中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社会政治问题，一般是直接由经济利益因素而引起、以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又需通过特定的方式和途径加以解决。因此，它就必然要从传统政治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学科，用以系统阐发经济的政治功能，揭示其基本特征和运作规律。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②参见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③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4—555页。

④《礼记》中记载有孔子讲“苛政猛于虎”的故事；《说苑·敬慎》：“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

⑤见《管子·乘马》。

⑥见《管子·治国》。

⑦见《管子·五辅》。

⑧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128页。

⑨意即整理丝绪，理出丝缕叫经，编丝成绳叫纶。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大事。

⑩意即研究经书，为诸经作训诂，或发挥经中义理之学。推尊儒家经学，成为自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

⑪1912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谈到关于“经济学”中文译名问题时认为：对于西方“经济学”这门“有系统之学说，或以国富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等，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⑫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⑬参见【日】三好修：《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9页。

⑭参见【日】石川荣吉《现代文化人类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32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6页。

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3页。

⑰马歇尔·阿弗里德（Marshall, Alfred, 1842—1924），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主要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建立起了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曾被西方吹捧为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声称创立了“马歇尔经济学”。他把“经济”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日常生活事务的科学”，并且不主张在“经济学”前再冠以“政治”。

⑱现代西方政治学家认为，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的（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9—581页）。

⑲【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⑳参见【美】阿兰·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344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4页。

㉓㉔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168—169、486页。

㉖见【美】约翰逊：《政府到底该干什么》，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㉗《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8—149页。

㉘参见《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9页。

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300页。

（责任编辑 曾德国）